

苏联出现在拉丁美洲

詹姆士·西伯奇著

供内部参考

苏联出现在拉丁美洲

〔美〕詹姆士·西伯奇 著

辛 华 季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National Strategy
Information Center, Inc.
The Soviet Presence in
Latin America

James D. Theberge
Crane, Russak & Company, Inc.
New York. 1974

根据纽约克兰劳萨科公司1974年版译出

苏联出现在拉丁美洲

〔美〕詹姆斯·西伯奇 著

辛 华 季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3.5印张 67,000字
1976年7月第1版 1976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3002·179 定价0.29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说明

《苏联出现在拉丁美洲》这本书，介绍了苏修对拉丁美洲的扩张和渗透，勾勒了两个超级大国在西半球争夺的轮廓。书中援用了必要的材料，对苏联和拉美国家关系的历史，苏修对拉美进行扩张和渗透的目的、手段、得失和前景，作了论述。其中一些论述和材料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者詹姆士·西伯奇是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拉丁美洲研究室主任，同美国国务院关系密切，立场和观点是反动的，阅读时请注意分析和批判。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俄国对拉丁美洲的兴趣	3
第二章 苏联外交.....	15
第三章 苏联的贸易和援助	20
第四章 苏联的间谍和颠覆活动	29
第五章 莫斯科支持革命的暴力	40
第六章 同拉丁美洲共产党的关系	51
第七章 同古巴的关系：冲突与和解	60
第八章 苏联海军力量出现在加勒比海域	71
第九章 苏联外交的主要目标：智利与秘鲁.....	78
第十章 苏联进展得失的总结.....	95
附录 拉丁美洲各国共产党和极左派的状况.....	100

序 言

俄国卷入拉丁美洲的事务，是较近的事态发展。沙皇的外交政策对相距遥远的地球这一角落几乎一点也不注意。1917年以后，俄国的新主人共产党设法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促进革命。但是，即使对他们说来，拉丁美洲也不是一个很优先的目标。更加有希望得多的革命机会在其它地区招引着他们。确实，克里姆林宫曾努力在整个拉丁美洲创建忠诚而又纪律严明的共产党。但是，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拉丁美洲才变成苏联的野心所向的一个较重要的目标。

在这本专题著作中，詹姆士·西伯奇先生分析了战后苏联对拉丁美洲政策的演变。他着重剖析了克里姆林宫用来推行其政策的主要手段：传统外交（这种外交近几年来得到苏联海军在加勒比地区日益频繁的出现的支持）、贸易和援助、间谍和颠覆活动以及对革命暴力活动的有选择的支持。其中一章专门叙述了克里姆林宫同拉丁美洲各共产党和其它革命政党的关系。还详尽地研讨了莫斯科同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以及新近消逝的智利阿连德政府和依然在台上的秘鲁革命军事政权打交道的情况。

西伯奇先生指出，莫斯科在拉丁美洲的当前目标依然是极为有限的：“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扩大苏联的势力，保卫‘社

会主义的'古巴,并削弱美国的依然占优势的地位"。这是一种小心翼翼的政策,"其意图在于扩大苏联的势力而不冒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苏联人分明知道,他们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能指望在这个地区建立政治优势。

另一方面,莫斯科的长远抱负也是最清楚不过的,即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谋取政权。据作者判断,苏联在拉丁美洲的地位,尽管依然"远远没有达到威风凛凛的地步","今天已比十年前巩固了",而且正在变得更加巩固。而且,俄国人看来要继续作出这种步步为营的努力来改变力量对比。"尽管出现缓和,在莫斯科方面并没有什么迹象表明它要放弃那种对于拉丁美洲出现的变革,只要可以用来反对美国,就都要加以利用的政策。"对美国地位的这种逐步侵蚀所包含的终极含义在未来的年代中必将引起华盛顿决策者的严重关切。

西伯奇先生在乔治城大学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工作。他撰写并讲授过一系列拉丁美洲政治和经济问题。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牛津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公共管理学硕士学位。在他出版的其它著作中包括《俄国在加勒比》。他还是《苏联在加勒比的海上力量》、《政治和战略含义》的特约编辑,《加勒比的稳定》的特约撰稿者。他在1964—1965年任哈佛大学的利塔沃学会会员,1966年任美国财政部长的特别顾问,1957—1958年任海德堡大学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学会会员。

国家战略情报中心主任

弗兰克·巴尼特

1974年6月

第一章 俄国对拉丁美洲的兴趣

直到不久以前，俄国对拉丁美洲的兴趣还很小。沙俄在十八世纪同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在十九世纪同新独立的一些拉丁美洲共和国只有非常零星和稀少的接触。^①当俄国的前沿贸易点从阿拉斯加沿太平洋岸南下时，它先后使墨西哥的西班牙总督和独立后的墨西哥的新统治者感到震惊，他们害怕俄国人打肥沃的上下加利福尼亚省的主意。^②但是，除去这种南下的侵扰和偶尔对这个地区派出科学远征队之外，直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在俄国和拉丁美洲之间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关系。^③它在1885年才同阿根廷、在1887年同墨西哥、在1890年同乌拉圭建立了外交和贸易联系。拉丁美洲离俄国本土太远，在战略上也不重要，总之，这个地方的油水少得

① 费奥多尔·卡尔扎文，作家兼翻译家，在拉丁美洲呆过一个时期的第一个俄国人。他在1782—1784年期间曾访问古巴。弗朗西斯科·米兰达，拉丁美洲独立运动的领袖之一，旅游过俄国，后来成为凯瑟琳大帝的宠儿。参阅维克托·沃尔斯基：《苏联对拉丁美洲的研究》，载杰·格雷戈里·奥斯瓦德：《苏联心目中的现代拉丁美洲——历史文献汇编，1960—1968年》，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出版社，第13页。

② 参阅斯蒂芬·克利索尔德编著：《文件一览：苏联同拉丁美洲的关系——1918—1968年》，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0年，第1页。

③ 十九世纪中，俄国确曾同巴西发生了关系，然而当时巴西不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是葡萄牙的布拉甘沙王朝的一个支系统治下的君主国。

不足以引起沙皇的政客们的认真注意。

在1917年革命以后，沙皇的外交政策格局被布尔什维克的救世主般的勃勃野心所取代。诚然，拉丁美洲在这些抱负中并不占有突出地位，因为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新的苏维埃领导面临着急迫得多的革命任务。^①而且，“美帝国主义”在这个地区的力量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处于创始阶段，对共产党进行革命并不有利。拉丁美洲没有完全被忽视；但是莫斯科更感兴趣的是利用拉丁美洲来影响英国和美国在其它地区的政策，而不是在当地发动革命。

当地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拉丁美洲分支的建立以及1924年的同墨西哥建立外交关系，为增进苏联的利益创造了新机会。^②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墨西哥共产党在中美洲培植共产主义方面干得远比在墨西哥本身成功，在墨西哥，当地人民显然宁愿自己搞革命，而不要苏联的援助。往南，苏联的影响在拉普拉塔河流域国家有了某些扩展，特别是在阿根廷那里的共产党是加入共产国际的第一个拉丁美洲共产党。1930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建立了共产国际南美洲书记处，并赋予它扩大苏联的影响和监督向这个大陆的南部地区输入代理人的任务。^③

① 姆·恩·罗伊，《回忆录》，孟买，1964年，第346页。

② 墨西哥是第一个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拉丁美洲国家，乌拉圭两年后（1925年）效法墨西哥。

③ 在斯蒂芬·克利索尔德：《两次大战之间苏联同拉丁美洲的关系》一文中，详尽讨论了战争间隙时期苏联同拉丁美洲的关系，该文载杰·格雷戈里·奥斯瓦德和安东尼·杰·斯托弗编著：《苏联和拉丁美洲》一书，纽约：普雷格公司，1970年版，第15—20页。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莫斯科的政策的目的旨在创建当地的忠诚和纪律严明的共产党，通过正常的外交和贸易途径扩大苏联的势力，并侵蚀英国和美国的优势地位。然而，现已周知，这项政策由于试图把莫斯科的外交政策的利益同当地的党的需要和共产国际的狭隘的宗派主义态度调和起来，陷入了左右为难的窘境。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的到处插手的极左策略不仅成效甚少，而且造成苏联同墨西哥（1930年）、阿根廷（1930年）、智利（1932年）、巴西（1936年）和乌拉圭（1936年）的外交关系的破裂。但是，即使当时苏联执行更为灵活的政策而且共产国际采取不那么极端的策略的话，俄国是否会取得大得多的进展，也还是令人怀疑的。在拉丁美洲不存在革命的形势。尽管发生了某些人民骚乱，拉丁美洲传统的上层人物及其军队中的同盟者仍然牢固地驾驭着局势。

在俄国革命后的头二十年中，人民政党的产生、带来激进社会思想的欧洲人的移入、战斗的劳工组织和改良主义的中产阶级的领导的出现以及农村贫民的大量流入城市，在拉丁美洲引起了政治和社会骚动事件。这种局势看来有助于产生激进政治团体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但是苏联却无法加以利用。莫斯科对这个地区的无知、它对拉丁美洲文化和传统的轻蔑态度以及共产国际对这个地区共产党的指示的教条式的僵硬性质都对事情的发展不起好作用。但是主要的问题却是苏联深陷于自己国内的问题之中，而拉丁美洲在苏联的要事单子上根本不名列前茅。而且，在三十年代，拉丁美洲得风气之先的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更倾向于选择德国的纳粹主义或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而不是俄国的共产主义。

在创建忠诚和纪律严明的当地共产党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其中少数的党在选举中取得一些成功。在智利,一个强大的共产党的组成促进了一个人民联合阵线的建立,这个阵线在1938年使激进党及其总统候选人佩德罗·阿基雷·塞尔达执了政。这样,智利成为(继法国和西班牙之后)由人民阵线统治的第三个国家,从而表明了共产国际的战略甚至在遥远的地区所具有的活力。尽管在两次战争之间取得的成果是微弱的,还是奠定了扩大宣传工作的基础,并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社会中取得了可贵的经验。

表一 拉丁美洲共产党的创建

国 家	年代	国 家	年代
阿根廷	1918	委内瑞拉	1931
墨西哥	1919	波多黎各	1932
乌拉圭	1920	巴拉圭	1933
智 利	1922	尼加拉瓜	1939
巴 西	1922	瓜德罗普	1944
古 巴	1925	马提尼克	1944
洪都拉斯	1927	多米尼加共和国	1944
厄瓜多尔	1928	玻利维亚	1950
危地马拉	1931	海 地	1959

材料来源:格·恩·柯罗梅茨编著,《拉丁美洲国家政党》莫斯科:苏联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1955年。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的一个短期中(1941—1947年),苏俄和当地的共产党有了相当程度的影响。苏联和西方大国在战时建立的同盟改善了当时的政治气候并为苏联

扩大同拉丁美洲的外交往来提供了方便。^① 在莫斯科指导下，当地共产党支持盟国进行战争，并利用自己的影响来防止罢工和对战时生产的破坏。但是在1947年开始的冷战很快就扭转了这种趋势。由于斯大林激烈批评拉丁美洲国家的政府，特别是它们同美国的密切联系，并要求当地共产党公开宣布它们对苏联的忠诚，苏联同拉丁美洲的关系变得日益紧张。战时对苏联的善意很快地消散，外交关系断绝了，这些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

斯大林的僵硬政策和当地共产党在冷战高潮中的不妥协性使得俄国在此期间几乎不可能同拉丁美洲国家合作。斯大林似乎确信，在苏联集团和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之间，没有中间立场可言。曾经出现过的要改变这种僵硬立场的少许迹象，甚至在斯大林逝世以前也有过。但是，只是在1953年以后，才明显地看出它已经重新制订基本政策，这时，俄国再次开始同拉丁美洲国家建立外交、贸易和文化联系。

苏联当前的目标

莫斯科当前在拉丁美洲的目标是容易说明的：在一切有可能的地方扩大苏联的势力，保卫“社会主义的”古巴，并削弱美国的依然占优势的地位。为达到这些目的，苏联一直准备同民主分子、独裁者和极端激进的革命者合作，即使他们积极反共也罢。莫斯科对于卡斯特罗早期的桀骜不驯，表现了很

^① 1939年，莫斯科同任何拉丁美洲国家都没有外交关系。到1946年，它同十三个国家建立了关系，拉丁美洲共产党的影响和威信达到了新高峰。

大的容忍，并对在巴西和阿根廷发生的对共产主义的镇压视而不见。当前，它宁可要一个执行对苏友好的外交政策的反共政府，而不要一个抵制苏联影响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言听计从但本质上反共的政权，象秘鲁的贝拉斯科军事独裁政权，看来比铁托的南斯拉夫更能适应苏联当前的企图。

从1962年导弹危机起，赫鲁晓夫在拉丁美洲的冒险主义已为一种较为谨慎的政策所取代，用以扩大苏联的势力而不冒同美国发生军事对抗的风险。莫斯科采用了一整套配合得很好的政策手段：外交、宣传、间谍活动、政治煽动、革命暴力、军事和经济援助，甚至海军力量。苏联当前正在把一种设法同资产阶级政府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的更为积极的“传统”外交，同一种大量扩建战略军事力量和频繁出动海军以支持它的外交活动的作法结合起来。它还在“意识形态和具体使命”方面加强了对当地共产党和外围团体的指导，并对革命暴力活动给予更多的隐蔽的支持。

意识形态方面的立论

苏联把拉丁美洲视为在第三世界占有特殊地位的地区。这是一个存在着比较成熟的资本主义的地区，然而这里缺少为取得共产主义胜利所必需的“客观”和“主观”条件。武装斗争并非作为一般原则而遭到反对，而只是由于它取得成功的前景不大，并由于不成熟的夺取政权的尝试可能给俄国民族利益带来种种不利影响。拉丁美洲的落后状态要求有一个“过渡阶段”来为社会主义复兴准备政治和经济基础。莫斯科

认为,这个地区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必须先经历一个“人民民主”革命阶段。

虽然苏联对拉丁美洲的看法在意识形态上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所左右,但它对逐个国家的研究却表现得越来越牵强附会。苏联著作中的大多数分类是把拉丁美洲当作一个整体来谈论的;但是,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加勒比地区被看作一个具有不能一概而论的特点的地方。在莫斯科看来,它是美国的“战略后方”中最敏感的地带,是拉丁美洲不久前遭受美国军事干涉的唯一地区。它还被看作同美国保持着特别密切的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的地区。

在苏联对拉丁美洲的当前战略中,当地共产党被要求在左翼联盟、激进革命政府、甚至“进步”军人政权中发挥突出的作用。这种战略要求共产党参加人民阵线联盟,渗入民族资产阶级中的“进步”阶层,并使群众动员起来和激进化。在东西方缓和时代,它还要求苏联通过一种不危及同美国改善关系的方式对拉丁美洲革命运动提供支持。

莫斯科并不幻想亲苏的共产党或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轻而易举地通过联合阵线策略“和平”执政,或不经激烈的阶级斗争和暴力行动实现这一点。1973年9月戏剧性地推翻智利社会党—共产党联盟这件事非常清楚地表明,“和平道路”面临重重困难。由于发生智利事件,拉丁美洲军事和民主政治领导人比以前更清楚地意识到苏联和古巴的干涉。拉丁美洲共产主义运动严重分裂,“左翼和民主力量的团结”依然不过是句口号而远非现实,这种情况使得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问题复杂化了。

在阿连德在智利取胜后的一段时间里，看来好象通向社会主义的和平、选举道路可以在本地区的其它地方取得成功。但是俄国人在支持阿连德方面表现得相当谨慎小心并对共产党夺取政权的成功前景表现得疑虑重重。乌拉圭左翼联盟（广泛阵线）的候选人在1971年总统选举中的败北、1973年9月的智利军事政变以及1973年委内瑞拉总统选举中左翼联盟（新力量）的得票寥寥无几，都表明选举道路在拉丁美洲遭遇难以克服的障碍。

当前，莫斯科看不出共产主义在任何拉丁美洲国家有早日取胜的前景。现在它赞成从联合政府到共产主义中间有一个较长的过渡时期，以便把它承诺的政治和经济义务限制在它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一次成功的革命将使苏联有责任去保证这个新的共产党政权得以生存下来，而这将大大限制苏联的回旋余地。莫斯科愿意看到这些国家在共产党接管以前在资金积累和发展方面能够达到自立的水平，以便使这些新的共产党政权有较大的机会生存下来而不会向苏联提出使它感到为难的要求。在阿连德统治下的智利，这种情况是明显的。由于深深陷入古巴的事务而花费巨大的苏联，后来鼓励阿连德从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资金，采取一种自助政策而不指望苏联的大规模援助。

合法的和革命的斗争方式

尽管苏联和听命于莫斯科的拉丁美洲共产党强调“合乎宪法”或“合法”的斗争方式，莫斯科的政策本质上是机会主义

的，它囊括了所有的斗争方式——和平的或暴力的、合法的或非法的、单独进行的或联合进行的——须视当地政治条件所造成的机缘而定。当地的亲苏的党被告知，假如不能和平取得政权，它们必须随时准备“迎接任何可能发生的事件”（包括武装斗争）。

每当和平的斗争方式（然而它并不排除阶级斗争甚至使用暴力）可望获得成功或取得成就的时候，苏联就主张采取这种斗争方式，而当武装斗争看来可能失败的时候，它就谴责武装斗争是“革命的冒险主义”。在诸如危地马拉和尼加拉瓜这样的国家，通往社会主义的“和平道路”被堵塞，莫斯科就准备考虑以革命暴力作为一种可行的变革手段。但是，采取了精心的预防措施来掩饰苏联策动内部颠覆和革命暴力的行径。只要有可能，莫斯科总是使用古巴和东欧代理人去从事一旦失败就会置苏联于尴尬境地的那些高度危险的行动。它能够这样作，是因为苏联对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东德、波兰、匈牙利和在一定范围内对罗马尼亚的情报机构的控制是如此严密，以致不管实际任务是什么，它们都不过是苏联情报部门的延伸。^①

莫斯科在向拉丁美洲扩大其影响的活动中既有机可乘，也碰上问题。美国对拉丁美洲国家的强大经济和文化影响有利于莫斯科。它已经使美国成为当地致力于独立发展的民族主义者的头号目标和搪塞他们自己的棘手问题的替罪羊。经

^① 参阅约翰·巴伦：《克格勃》，纽约：读者文摘出版社，1974年版，第22页；奥尔兰罗·卡斯特罗·伊达尔戈：《菲德尔的间谍》，迈阿密：西曼出版社，1971年版，第62—63页。

济民族主义的高涨、对跨国公司活动施加的限制、左翼军事独裁的出现、在许多国家中的强大民粹主义倾向以及 1970 年联合战线战略在智利的暂时成功，看来也对莫斯科有利。莫斯科认为，这些事态发展已经削弱华盛顿在拉丁美洲的政治和经济支配地位，并为进行思想渗透提供了风险最小、代价最低的新机会。

在当前的苏联战略中，从战术角度很强调利用中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为的是加强当地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培植同莫斯科的紧密关系。苏联人希望加强“民族资产阶级”（即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者）的反帝潜在力量并从中取利，这个阶级感受到外国资本入侵的威胁，因而愿意同共产党集团建立外交和贸易关系，以抗衡美国的影响。民族资产阶级可望渐渐地不再相信外国投资真能给他们带来技术进步、工业发展和较高的生活水准。在拉丁美洲的军界、官僚、技术界和上层知识分子中，反对美国 and 外国资本的分子被认为特别容易响应共产党的“反帝”宣传，他们被当作潜在的盟友而记录在案。

中产阶级中的民族主义阶层被看作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背后的决定性力量。莫斯科相信，一个由共产党、左翼和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力量组成的联盟——它们为反对日益增长的美国经济势力而联合，又为社会进步的缓慢速度所挫伤——将在和平的政治竞赛中最终取得政权，或通过同“进步的”军事政权的合作取得决定性影响。这些政权，不管是文的还是武的，那时将在为摆脱美国而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寻求苏联的支持。

苏联出现在拉丁美洲的事实在七十年代比十年前更加清